

三一重工大股东最昂贵离婚 造就 22 亿身家女富豪

众人惊诧:谁是王海燕?

2012年5月最新发布的“新财富500富人榜”上,王海燕以22亿元的身家成为今年新上榜的三位女富豪之一,总排名492位。她是三一重工高级副总裁袁金华的前妻,因与袁婚姻关系终止,获得了三一重工股份。

有人戏称,这是A股市场“最昂贵”的离婚。离婚后,袁金华依然以35.8亿元的身家位居富人榜333名。

特别之处在于,这场涉及巨额财产分割的婚姻解体极为低调,其财富交割的顺利和一些企业家离婚案的沸沸扬扬乃至影响公司上市,形成鲜明对比。

“前妻”22 亿财富还原

2003年7月3日,袁金华激动不已。这一天三一集团旗下的三一重工(600031.SH)成功A股上市,发行价每股15.56元,发行总股本2.4亿股,共募集资金72亿元。

袁金华和梁稳根、唐修国、向文波、毛中吾等人80年代开始创业,从焊接材料厂做起,至2000年共同创建三一集团,集团成立时袁金华占股8%。三一集团是三一重工的控股股东,三一重工上市时持有其17380.93万股股票,持股比例为96.56%,到2011年末,稀释至56.38%。

不过,袁金华的家庭却出现了危机。三一国际的招股说明书中披露,2005年6月,袁金华将其持有的三一集团8%股权中的3%,转让予前妻王海燕。“前妻”一词显示,2005年6月前二人很可能已经离婚,但确切时点于公开资料中无从查询。

此后的2008年9月,袁金华将其持有的三一重工0.25%的股权,以

王海燕以22亿元的身家成为今年新上榜的三位女富豪之一。榜单上显示,她是三一重工高级副总裁袁金华的前妻,因与袁婚姻关系终止,获得了三一重工股份。有人戏称,这是A股市场“最昂贵”的离婚。

1元的象征性代价转让给三一集团实际控制人梁稳根。由此,袁金华持有三一集团4.75%的股份,王海燕持有3%。

正是由于受让了三一集团3%的股权,王海燕拥有了巨额财富。三一集团不仅控股三一重工,三一国际两家上市公司,还持有多家公司。

王海燕的财富,主要由三一重工流通股与限售股,以及三一国际股份三部分组成。

2011年年报显示,三一集团持有三一重工限售条件股份4281311012股。若以2011年12月30日的三一重工12.54元收盘价计算,王海燕3%的股份市值约16.1亿元。若以2012年5月17日14.03元收盘价计算,王海燕在其中股份市值约18.02亿元。

就在袁金华向梁稳根转出股份后一个月,三一重工发布向特定对象(袁金华、王海燕在内的多位自然人)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用于购买资产预估值为22亿元、三一重机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通过此项交易,袁金华、王海燕名列三一重工十大限售股自然人股东之列。随着三一重工实施分红送股,两人的股份于2011年底

分别达到25668519股和16211696股。若按照去年12月30日的三一重工12.54元收盘价计算,王海燕持有的三一重工限售股市值约2.03亿元;若按5月17日三一重工收盘价约14.03元估算,约2.2亿元。

此后,三一国际顺利在H股上市,袁金华和王海燕分别持有其控股股东三一BVI的4.75%和3%的股权。2011年年报显示,三一BVI持有三一国际72.29%的股权,共计22.5亿股。若按2011年12月30日三一国际收盘价6.33港币,0.81元汇率计算,王海燕股票总价3.46亿元;而以最新的5月17日收盘价5.38港币,0.81元汇率计,为2.94亿元。

三部分加总即,若按照2011年末股价计算,王海燕身家为21.59亿元,而若按照5月17日股价估算,身家有所增值,约23.16亿元。而且这一统计,还未包括三一国际控股的未上市公司价值。

袁金华、王海燕往事

袁金华和王海燕分别出生于1959年和1958年,两人都曾在湖南省娄底地区的涟源市生活和工作。

1982年,袁金华从哈尔滨工业大学获得工学学士学位后回到湖南,留在湖南洪源机械厂工作。而王海燕则学习的是医学专业,预备着未来成为一名妇产科医生。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机遇让这个家庭起了波澜,两人的生活轨迹也开始渐行渐远。

80年代中期,袁金华认识了原兵器工业部某企业工作的梁稳根、唐修国、毛中吾,并成为好友,创业的激情和理想将四人凝聚在了一起。1985年,袁金华从工厂辞职,与另三人一起开始创业。1989年6月,袁、梁、唐、毛四人带着东拼西凑来的6万元,创



立了湖南省涟源市焊接材料厂,也就是三一集团的前身。

此后十多年间,作为集团创办人之一,袁金华曾任三一集团董事、三一重机董事长、三一重工高级副总裁。三一集团旗下的三一重工、三一国际也分别于2003年和2009年上市。

就在袁金华身份发生巨变的同时,1989年2月以来,王海燕对外公开的身份,始终是涟源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主治医生,也未在三一集团的企业中担任任何职务。

不过,当记者5月17日联系涟源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时,该科医生表示确有人,但已经很久没有来上班,工龄十多年的护士长也未见过她。

一名认识袁金华的人说,印象中的袁金华平素生活简朴,习性和气质是地道的湘中农民,没有花花公子的作派。另一名人土回忆,王海燕近年来每年都会参加三一重工的年度股东大会,和公司高管坐在一起,但从来没有发过言。

(摘自《21 世纪经济报道》)

南京钢贸女老板自杀 引发蝴蝶效应

去年年底的钢贸商“跑路”、“骗贷”、“钢材重复质押”等传言已经让银行对钢贸企业授信“提心吊胆”。今年初南京的各大银行更是加大了对钢贸企业融资的严格审批,在这个漫长的行业“寒冬”,钢铁贸易企业的每个举动已然成为行业内外最为引人注目的焦点。

南京钢贸女老板自杀
引轩然大波

近日,最受业内关注的事件恐怕莫过于“南京钢贸女老板自杀”。在南京钢贸企业集中的下关区,一家叫做浜森物资的公司女老板自杀。

尽管其自杀原因目前警方仍在调查中,但事件还是在业内掀起了轩然大波。从最早一篇名为《钢贸市场融资黑洞:南京下关一女老板自杀》的新闻报道之后,网上关于该事件的各类话题分析一发不可收。

在多数文章中提到,“百万资金缺口逼死南京钢贸女老板”、“钢贸领域或成融资黑洞重灾区”等。很多报道认为,这位在南京经营钢材生意且年仅35岁的女老板王某自杀,疑因陷入“融资黑洞”而走上绝路。这不禁令时下由于“行情低迷”、“资金链紧张”而神经紧绷的钢材贸易行业一片风声鹤唳。

南京多家银行
对钢贸业全线停贷

王某为何选择“离去”?王某所在公司的信贷和负债金额又是多少?一时成为业内争相打听的话题。而钢贸企业的担心并非多余。事发后的5月9日,南京一家银行内部员工告诉《现代物流报》记者说,“因多种原因,即日起,南京多家银行将对钢铁贸易企业实行暂停贷款。”

据了解,去年年底的钢贸商“跑路”、“骗贷”、“钢材重复质押”等传言已经让银行对钢贸企业授信“提心吊胆”。今年初南京的各大银行更是加大了对钢贸企业融资的严格审批。

在上述银行内部员工看来,“此次曝出有钢贸企业老板自杀,这让银行以及担保公司对钢贸企业更是‘谈虎色变’。”

随后,多位南京的钢贸人士向本报记者证实了这一说法。南京宁德国际钢材城总经理刘延进告诉本报记者,“南京这边许多银行确实已对钢贸行业暂停贷款,近期的贷款下放速度本就影响到了正常经营,现在不仅钢贸企业完全无法从银行贷款到款,先前的贷款到期后也很难实现续贷。”

很难想象,“现在银行被吓怕了,其实这件事(王某自杀)远没网上说的那么玄乎”。

资金问题或只是
悲剧发生的客观原因

对于王某自杀的真正原因,业内流传着多个版本。不外乎融资问题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因个人感情原因无奈轻生等。警方在回答记

者提问时称,死因仍在调查当中。

本报记者辗转联系到一位与王某相识并有过生意往来的人士。在他推测看来,王某不太可能完全为了“钱”的事情自杀,可能是因为感情问题。“她(王某)离异后感情生活一直不顺利”。

资金问题或许只是她(王某)自杀的客观原因,“长期以来坎坷的感情纠葛及多愁伤感的心境,或许才是促使她选择离开的内在原因。换句话说,那小额的资金缺口只是扮演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上述人士的这一说法得到了南京当地许多熟识王某的人的认同。

通过该人士帮助,本报记者在5月10日登录了王某QQ的空间。在王某的空间日志中,许多篇爱情感伤的文章似乎在写她自己的心声。其中,她的空间首页第一个签名便写道,“如真诚是种伤害我选择谎言;如谎言是种伤害我选择沉默;如沉默是种伤害我选择离开。”

一位熟识王某而不愿表明姓名的人士透露,王某所欠的资金缺口并不大。南京市场有3家公司给王某公司做联保,总计200万,但用了王某自己在南京的一套房子作为抵押,目前这套房子已经被银行控制,据说这套房子的价值超过百万元。而在网上的消息中,关于王某所欠债金额正一天天地呈现出递增,“500万、2000万元……”

认清行业个别事件
减少以偏概全

王某已经走了,但是事件本身所带来的影响远还没有散去。在这个漫长的行业“寒冬”,钢铁贸易企业的每个举动已然成为行业内外最为引人注目的焦点。行业几乎已成惊弓之鸟,往往个别事件总是能在圈内引起巨大的轰动,甚至恐慌。一些钢贸老板认为,不可否认,钢贸业中确实存在着一些诸如信贷审批不严、资金链断裂、负债跑路等乱象,但都只是个别现象,并不代表整个行业。

对此,一位名为“太远2010”的网友在天涯上发帖,引起了业内外的大关注。帖子称:“这位女企业家(王某)为爱倾注了所有的一切时,换来的却是绝情与欺骗,对她的打击犹如惊天霹雳。”

该网友在文中呼吁人们不要把一个企业的现象夸大其词、以偏概全,说成是整个钢贸行业的金融漏洞,这无疑使本就处于困境中的钢贸商雪上加霜。一旦由此引发银行停贷,将对行业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帖子中还提到,因为钢贸行业的特殊性,其对银行的关系密不可分。一旦银行停止对行业的资金融入,那么资金链将要断裂的很可能就不止一家企业。

就此事件,本报记者也联系了南京市工商联钢铁贸易商会。其秘书处人士表示,真实情况还在进一步了解中。希望在澄清公告发布之前,业内不要再有过多猜疑。

(摘自《现代物流报》文/王京路宁)

农民工幸福感调查： 泉州第一 深圳倒数第一

小盘在广东打工6年了,6年里,他换了8份工作,那些只做了一个多月甚至一两个星期的工作已多得数不清了。

小盘中专学的是模具专业,刚出校门也怀揣着梦想。“但一段时间后,梦想就慢慢地没了。”他说,“有一段时间,我就不相信找不到自己喜欢的工作,于是不停地换,直到把钱花光。最后发现,真的找不到。”像小盘这样的农民工在全国2.4亿农民工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干不长、频跳槽、发展空间小、努力成效低”,这是当前农民工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和众网联合发布的调研成果显示,中国农民工的幸福感从多个维度看都显著低于国外体力工作人员。从幸福感的角度,幸福感最高的前三位是泉州、青岛、长沙,幸福感最低城市是深圳,其次是东莞、上海。

农村的逃兵 城市的孤鸟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1年5月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工数量已达到2.4亿人,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

“农民工的主观生存感受记录了整个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孙健敏教授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作为中国转型期的一分子,农民工负荷了多重角色,而他们的努力,最直接承担了整个社会转型的成本,包括社会成本和心理成本。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规划与管理系主任叶裕民教授也对记者表示,中国未来20年,城镇化能否正常推进,关系到中国城市转型和经济是否能成功。

据了解,此次调查人员共选取全国各省份20个主要用工城市进行对



比,数据从众网农民工数据库(截至调查时共有注册用户532.9971万人)中随机抽取样本,由众网众众研究中心采取电话调查方式进行访问,收集有效问卷2473份。

据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副主任胡平介绍,通过对农民工社会距离数据的分析,农民工与所生活的城市并不是非常融合,而且不同年龄阶段、收入、教育等的影响并不明显,这说明整体农民工的身份妨碍了他们和所在城市的社会融合。

“调研发现,城市并不完全接纳所有农民工,其中小部分人群(30%)依然认为他们被拒绝和被排斥。”胡平介绍,如果让农民工再有选择的可能,46.2%的农民工愿意选择继续留在所在的城市,有23.3%的农民工愿意选择去别的城市。

众网众众研究中心李久鑫博士对记者说,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中国农民工的主体,他们通过“短工化”、“旅游式”的打工或者父辈打工的积累基本能够满足生存需求,但他们也有更高的追求,希望能够平等地享受城市生活,最终在城市生根。“但他们原有的社会关系被割裂,新

社会关系陷真空,致使他们成为了‘农村的逃兵,城市的孤鸟’,目前生根非常渺茫。”李久鑫说。

泉州最幸福 东莞最疏远

“这个社会群体的幸福感以及他们所得到的社会支持感,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和人们的福祉都非常重要。”孙健敏说。根据调研成果,专家列出了中国20个主要用工城市农民工主观感受的几个最:感觉“最幸福的城市”是泉州;“最不幸的城市”是深圳(幸福感);感觉“最无力的城市”是北京,“最积极的城市”杭州(情绪倦怠感);感觉“最受支持的城市”是青岛,“最差支持的城市”上海(社会支持);感觉“最疏远的城市”是东莞,“最亲密的城市”是大连(社会距离)。

泉州缘何能成为在农民工心目中是最具幸福感的城市?

据胡平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在对农民工幸福感进一步从“生存、关系、发展、生活水平、家庭关系、工作学习、社会地位”七个维度研究时发现,福建泉州在“生活水平、工作学习”的维度上排名首位,在“发展”、

“生存”维度上排名第二、三位。

“泉州的城市环境及经济发展可能更适于农民工生活,社会经济竞争并不非常剧烈,农民工的幸福感会比较高;同时在学习和发展层面给予农民工的机会可能更多。”胡平说。

相比之下,与前些年相比,长三角对农民工的吸引力似乎正在下降。

胡平告诉记者,以浙江杭州为例,杭州整体农民工幸福感排名第7位,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排名降至第15位,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对杭州的评价明显低于老一辈农民工的评价。

调研发现,长三角的农民工收入要求最高,在上海和浙江的农民工收入要求比在广西和山东的农民工收入要求高出700多元;长三角地区的农民工实际花销也最大,比在中部地区的农民工每月花销多出363元。

这意味着,长三角地区尤其是杭州对于更追求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成本更高,“生根”的梦想可能更加遥远,这可能是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低的一大因素。

(摘自《中国经济网》)